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

曾立,谢鹏俊

(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湖南长沙410073)

(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湖南长沙410073)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原创性范畴,也是彰显新时代经济发展特征的标识性话语表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也就成为中国生产力实现质变性飞跃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脱胎于传统生产力,具有独特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突破个别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霸权、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的变化、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和生产模式更新迭代需要,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和时空方位。在此条件下形成的新质生产力也就具有了鲜明的目标导向和功能定位,即旨在构建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新发展格局、助推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升级、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总体式跃升、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能。为此,要以新型举国体制确保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健全以创新能力为导向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对新质生产力萌发的协同作用,布局并形成一大批以新促质的新兴和未来产业,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壮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中彰显新质生产力蕴含的创新与质变。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量变与质变;科技创新;自立自强;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23)12-0029-09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2312029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1]指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恩格斯^{[2]189}在晚年作了进一步论证,认为“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能使人的劳动得到解放,获取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列宁^{[3]623}也强调“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科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使中国的生产力总量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经济凋敝的衰微景象。但伴随数字资本的日益发展,个别西方国家通过科技手段迅速渗透世界各个角落,为维护既有的霸权利益,不惜采取“去中国化”的不公平做法阻滞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国内的经济的发展也进入新的转型期,“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

作者简介:曾立,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前沿交叉学科学院教授;谢鹏俊(通讯作者),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是国防科技战略先导计划项目“习主席关于构建国防科技创新体系重要论述研究”(编号:19-ZLXD-01-01-01-500-01)的成果。

显”^{[4]324},生产力增量的速度放缓,面临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难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5]从东北全方位振兴的紧迫性和典型性出发,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既为东北地区的经济转型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创新驱动转型指明了前进方向。新质生产力从词语结构上彰显了生产力的质变性特征,以“新”和“质”表明中国生产力即将迎来历史性飞跃,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迅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这一概念产生的时间较近,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掌握的文献资料表明,学界主要对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理论创新、实现途径和价值意蕴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如,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6],具备了较为成熟的量变基础和质变条件^[7]。就其基本内涵而言,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和创新驱动发展的高阶性、跃迁性、革命性的生产力,并由新质型的劳动工具、劳动者和劳动对象构成,展现出数字经济新形态。^[8]新质生产力的高智能、高算力、高素质的鲜明特征^[9]和全要素创新的核心要义彰显了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超越^[10],也就决定了新质生产力以原始创新实现爆发式飞跃,以集成创新和跟随创新实现渐进式飞跃^[7]。就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的表现而言,它内含生产力新质论、生产力要素创新论和生产力水平跃升论,分别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质量理论、马克思生产力发展理论和马克思生产力进步理论。^[10]这就要求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8],并从高质量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发展新兴未来产业和培育高素质劳动力等维度催生新质生产力,从而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6],为传统生产力变革跃迁提供中国方案^[11],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价值意蕴。综上可知,学界目前已初步勾勒出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知识谱系,并集中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阐释和价值描述。但研究的视野广度和学理深度还需深入,对新质生产力出场的逻辑分析还需充实,特别是要重点研究新质生产力将要解决哪些现实问题,以及深入探讨如何在实践中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和“质”,等等。这些都是继续研究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生长点,也是以学术话语阐释政治话语,从而“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12]的使命要求。因此,对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和实践进路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践解读,以“出场一定位一实践”的分析框架回答新质生产力出场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功能的作用效力和与此对应的实践进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

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具有独特的时空场域。在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和重大风险陡增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立足大历史观,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基于对中国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现实考量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理论性的创新性概念。

(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以科技霸权制约中国创新发展

中国的科技领域呈现追赶、保持和引领世界先进水平并存的复合型状态,快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推进了人类历史的演进和变革,世界逐渐进入了“东升西降”的大趋势和大潮流之中。但根植于资本逻辑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却矛盾叠加,“西强东弱”的国际政治格局逐渐动摇。在这样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不是反思自我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而是秉承“国强必霸”的权力理性审视中国的“和平复兴”,认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威胁到西方大国的既有地位,需要对中国极限施压、“筑墙设垒”,以维护自身的霸权利益。习近平总书记^{[13]50}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有一种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的心理。”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安感”和“警觉感”加剧,在涉及中国重大科技前沿的领域挑起科技战,并左右全球重大议题,将科技霸权进行学术包装和理论诡辩。新旧国际秩序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即在新旧事物的交替期,旧事物由于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会竭尽全力阻碍新事物的成长和发展。当前,中美战略博弈前景仍未明朗,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需要从“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加以认识”^{[14]177}。中国共产党人也历来具有“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15]23}的斗争精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16]就预见了西方国家的

经济封锁。因此,外部条件的限定和压制也是党和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团结奋斗的重要驱动力。面对西方的科技霸权,中国正是要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来破局。

(二) 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的变化促使经济发展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14]177}强调“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了变化”,传统依靠劳动力规模的发展优势不再明显,“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向来看,先发的经济强国都具备了创新发展的能力,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式造就了高新技术化的产业体系,形成了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以传统发展模式居多,而传统发展模式尽管能以高能源、高消耗的方式谋取生产力的进步,但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可以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自然资源条件,通过“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4]30}。当国内的经济水平提升后,劳动力成本随之上升,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也会日益凸显,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就会发生变化,逐渐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运作逻辑已不再是资本主义早期赤裸裸的剥削,而是从台前走向了幕后,剥削形式变得更为隐蔽。这些先发国家转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控制与渗透后发国家,形成“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形态。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在产业链上长期处于低端,难以真正在高新技术产业链实现新的发展,极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在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正处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4]83},改革发展过程中“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15]221}。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要素规模优势同周边国家相比已不明显,东盟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方面占据优势,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在“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13]5}的客观现实下,必须开辟新的发展模式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转型需要。

(三) 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亟待化解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反映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动态演进,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长期实践,生产力落后的社会矛盾得到历史性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发展的平衡性充分性问题成为矛盾的聚焦点,其中就蕴含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素。习近平总书记^{[14]338}强调:“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生产力发展面临总体水平不高的现实难题,人民的现实需求也集中在生存需求层面,发展的任务和难题在于如何“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14]25}。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深厚的经济基础促使人民群众的需求层次提升,需求内容发生扩展,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不再局限于物质产品领域,精神文化需求大幅增加。人民群众层次丰富的需求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诉求呼唤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跃迁,释放其潜在的发展空间。因此,当前的社会生产力供给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广大的社会群众发出了“人民之问”,在教育、工作、收入、医疗、住房、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期待,渴望更加扎实全面的共同富裕。因此,需要有效化解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提高“做大蛋糕”的能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同时,14亿中国人民造就的成熟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夯实了“生产力质变的量变基础”^[7],具备了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新质生产力的应运而生就是“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4]325},以新的高效益的生产力增量促进国家经济的整体动态平衡。

(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急需生产模式更新迭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主题和赶考旨归,生产力的发展成效是党能否答好时代考卷、人民是否满意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时间观“是以百年、千年为计”^[17],从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历史视野来看,党的赶考目标跨越百年。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提出“赶考”的历史性命题,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14]15},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赶考具有百年的时间跨度。在民族复兴的百年赶考中,发展生产力始终是党关心的重要主题。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人民推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同时加紧生产以支援前线,使党逐步迈向全面执政的赶考征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团结人民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扫清生产力发展的残余障碍,“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4]152};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打造开放型经济,使中国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力总量实现了巨大飞跃。因此,党在百年赶考的征程中已先后完成救国、兴国、富国的历史任务,并始终以答卷人的姿态应对时代考卷,不断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顺利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使“中华民族从地域性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18],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样态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世界历史民族必须以世界先进水平为发展参照,以先进生产力为发展动力。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每一次历史的跨越式发展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升级迭代。民族复兴的赶考目标彰显了其时空压缩性的发展特征,这就意味着需要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模式,而新质生产力就是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的先进生产力。

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功能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4]215}强调,新时代的经济“更要重视解决质的问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也是促使中国经济向更高级形态演进的过程。

(一)突破外部制约,构建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新发展格局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性谋划,旨在通过科技水平的长期性积累和突破性发展带动生产力发生质态变化,从而推动构建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新发展格局。当今世界,科技实力“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13]27},习近平总书记^{[19]190}还强调“中国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根子就是技术落后”。随着当前全球化的动力发生转换,新兴技术对全球化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强,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开始变动,既有的国际规则体系已不能满足西方发达国家对高额经济利益的追求,由此催生了“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逆全球化思维的产物,力图以技术垄断作为维持霸权主义的途径和手段。中国只有在科技上取得越来越多的“领跑”成果,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4]83}。从历史经验来看,科技革命的爆发点决定了生产力增长极的地理空间变化。中国共产党善于以历史主动精神实现对“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自觉把握”^{[4]11},在时局复杂的形势面前着力形成高新技术化的生产力模式,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完善突破外部环境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制约,塑造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发展样态,使新发展格局具有坚实可靠的物质支撑。同时,新发展格局具有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在要求,而新质生产力能以高质、高效的方式提升科技从知识形态转化为生产工具的效率,推动形成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将劳动资料快速转化为物质生产力,从而使产业链供应链有效运转,畅通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循环。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彰显了中国生产力总量的规模优势,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发展物质生产方面具备了不断产生增量和质变的能力,能够不惧个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胁迫和单边霸凌行径,形成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新发展格局。

(二)助推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

随着世界进入加速演变期,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精度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形态,改变国际政治格局。创新的重要性在新时代全面上升,要素数量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进入瓶颈区,迫切需要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模式。新质生产力就是对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回应,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在新时代演化发展的质变呈现。创新是生产力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引擎,创新的效率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掌握历史主动的意愿和能力。为此,习近平总书记^{[13]70}指出“创新慢了也要落后”,要以高效益的创新发展模式代替传统的发展模式。传统生产力依赖规模速度实现增长,新质生产力依靠质量效率实现跃升,这就体现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就是创新驱动形成的高新技术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能够以创造性的智能化活动推动数字经济得到跃迁式发展,促使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能够通过大数据得到实时反馈,并使生产更加精准匹配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变革传统的生产与消

费的关系,扩大消费者的选择机会,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追求。同时,在加快创造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将从劳动者数量的规模投入转为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能力,并使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升级变得更为迅速和全面,进而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螺旋式上升,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不可忽视的是,从中高收入经济体到高收入经济体,必须实现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只有适应这一经济发展规律,才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强国目标。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要解决我国经济“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4]82-83}。习近平总书记^{[4]215}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视为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根本性转变,提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预见性判断,彰显了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的实践导向,旨在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模式。

(三) 契合新发展理念,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总体式跃升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4]39},发展理念的性质和类型影响物质生产力的具体形态。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理論创造和实践要求而开辟的生产力跃升新路径。新质生产力是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如,新质生产力依靠创新驱动形成生产效率爆发的生产力,加速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地区的升级步伐,提升发展的质量和品质。新质生产力体现了协调发展的实践要求,“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4]325},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也是绿色的生产力,在新业态、新技术的发展中推进生产力的绿色转型,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开放性的高质量经济体。同时,新质生产力强调人在科技面前的主体地位,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20]474},将现代生产力从资本的无序扩张中分离出来,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高效能生产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因此,新质生产力彰显了新发展理念,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理论升华。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来看,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3]777},但决不能跳过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而是要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1]。社会生产力是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生产力的总量积累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邓小平同志^[22]曾在改革开放之初指出:“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生产力发达,才能真正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社会生产力的总体跃升是全面的质态变化的提升,新质生产力在质变的过程中也在开启新的量变,在量变与质变的有效互动中实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总体跃升。

(四) 形成新型生产方式,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能

新质生产力蕴含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写逻辑,它的形成将推动生产关系发生阶段性变革,形成新型生产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增添新的驱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多重社会变革叠加的全面追赶型现代化,在党和人民的长期奋斗中形成了“跟跑—并跑—领跑”的复合型发展道路。在追赶过程中越是接近“并跑和领跑”的若干领域,“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15]22}就越为复杂和突出,就越是要依靠新的发展动力来应对国际国内的复杂考验。同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共同富裕越来越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和集体诉求,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在于具有不断“做大蛋糕”的能力,需要具有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总量。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推进共同富裕又成为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因此,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生产模式以实现生产力的高质、高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强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为东北的振兴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23]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不同于传统社会生产力,它融合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突破性科技,促使脑力劳动比例大幅提升并朝着生产力智能化方向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也将改变人的劳动形式,人工智能开始替代部分脑力劳动,劳动者将拥有更多从事精神生产的时间,进而提高人的全面发展水平。因此,对新质生产力的功能阐释要“从实践逻辑的现代化导向进行探索”^[9]。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发性优势发展生产力,产生了数

字资本主义对人的价值剥削和精神掠夺。而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创造的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实现“数字时代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合理转向”^[9],使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科技惠民的价值导向,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和自我实现将得到充分彰显。这就能进一步优化社会经济结构,助推新一轮生产力的飞跃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形成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进路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渗透性要素,能够对生产力的实体要素进行全方位变革。因此,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进程中,需要以科技创新为起点和突破点,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形态。

(一)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保障作用

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的一项重要实践机制,蕴含赶超先进和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战略目标。当前,“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4]389},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极大地缩短了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时空距离,促使科技和经济呈现融合发展态势。而新质生产力以世界先进水平为实践参照和发展指引,其形成更离不开科技实力的质性飞跃。其中,关键核心技术内含“较强的技术颠覆性”^[24],具有强烈的产业关联带动效应。一般性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是渐进式的,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够带来生产力的爆发式飞跃。习近平总书记^{[19]192}强调“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关键核心技术对基础科学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就意味着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短期收益低等特征,仅仅依靠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难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仅在2022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就高达2023.5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1.4%^[25],规模位列世界第二位^[26]。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举国体制能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有力保障,以创造性劳动建立科技强国。新型举国体制立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治国理政能力为政治保障,注重创新引领的顶层设计和重大风险的预判管控,通过上层建筑及其生产关系的调适,以其能动的反作用释放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空间。为此,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政府、市场、企业、高校、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高效集合科技资源,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 and 高校作为我国研发活动的主体力量,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承担者。2022年,企业对研发经费增长的贡献达到84%^[26],高等学校和政府属研究机构对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44.8%和38.3%^[26],成为中国推进基础研究的中坚力量。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应用已经展现了初步成效,为进一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了信心。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靠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效完善,需要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整体框架下加快构建国家创新平台,增强信息、数据、知识、管理、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融通,形成产学研用的多元一体创新体系,打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难点、痛点和焦点,“降低生产力质变成本”^[7],以举国之力集中化使用创新资源和创造能力,形成科技突破的历史合力。

(二) 完善以创新能力为导向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人是生产活动中的能动性主体,人的劳动对生产力的质态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具备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劳动者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它以生产要素的高度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化建构起全新的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因此也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27]强调“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推动生产力朝着形态更高级的新质生产力迈进。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促使人的创造能力和劳动能力正在发生质的飞跃,能从事过去无法从事的高新技术活动,为系统推进三种不同形式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因此,完善以创新能力为导向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就成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是对人才供给结构的调适和优化,人才的供给状况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当前,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面临大量高质量人才缺口,应通过人才供给结构改革化解“人才结构性过剩”^[28]和高新技术行业人才短缺难题,以人才链打通创新链、融通产业链。首先,原始创新

需要大量的顶尖科技工作者以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企业、研究机构 and 高校等各类创新平台要善于“识别高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29], 优化选人用人机制, 为培养顶尖科技人才队伍提供可持续的后备力量。其次, 集成创新是在原始创新的基础上整合各类技术成果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着重“实现生产力的渐进式飞跃”^[7], 这就需要大批复合型的科技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因此, 高校应优化学科专业组合, 深化教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融合, 对接国家急需和新兴产业需要, 形成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动态培养结构, 培育擅长经营、管理、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再次, 开放创新是科学技术世界性和时代性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4]276}强调“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 对人才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提出了更高期待。一方面, 要加快塑造“中国特色创新生态”^[30], 为人才流动创设良好环境。激励各级技术创新主体构建各种形式的开放性创新合作平台, 例如联合实验室、数据共享平台、科技园区等, 将传统物质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物质形态和数字化、信息化形态相互依存的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 在创新环境不断优化条件下, 夯实科技创新的容错机制, 进一步提升各类人才的自由探索精神, 提振创新意愿。同时, 以兼容并包的科学家精神涵育科技人才的创新意识, 破除论资排辈的不良风气, 鼓励各类人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回应人民要求和市场需求。最后, 优化人才培养的评价体系, “在青年科技人才评价中需要关注社会贡献指标”^[29], 强化科技人才创新绩效中“成果转化的考核”^[29], 形成能够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科技创新模式, 将人才的关键变量转化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增量优势。

(三) 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变革生产力中的协同作用

政府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大主体, 密切影响着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表明, 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能够大幅增加生产力总量。在生产力量变与质变的过程中, 市场的繁荣不断奠定生产力质变的量变基础, 政府的有力调控能够抓住市场前景巨大的产业机遇, 推动生产力加速实现质性的飞跃。同样,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也是增量变化和质性飞跃的共同结果。中国在涉及经济发展的若干产业和科技领域已经“由‘跟跑者’变为‘同行者’, 甚至是‘领跑者’”^{[13]24}, 并且完成了“从全面追赶的单一型向追赶、保持、引领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复合型的转变”^[31], 已经具备了实现生产力再次变革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复合型的现代化道路上,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 生产力爆发式飞跃和渐进式飞跃的机遇逐渐成熟, 呈现“将强未强”的发展态势, 这就对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协同, 并共同作用于生产力变革, 才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方面, 要从有效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出发推动生产力变革。首先,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促进引导各类要素资源有序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次,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增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释放蕴藏其中的市场潜力。这就要求避免一些区域市场阻滞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 消除产生市场分割的条件, 打造统一的要素市场, 提升经济循环效率。最后, 发挥民营企业在生产力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支持民营企业快速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成熟产品和服务, 并注重资本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筛选功能, 通过资本对生产要素的集聚配置, 为企业自主创新注入发展动力。另一方面, 要从有为政府的调控作用出发确保生产力革新。政府要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 确保“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4]373}发展道路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并缓释外部环境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冲击。首先, 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减少对市场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完善产权保护、准入规则等基础性制度体系, 促进市场规模的有效发育, 引导市场选择更加注重长期效益。其次, 发挥国有企业对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推动国有企业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调联动, 集中优质资源开展原创性技术攻关, 通过重大创新成果突破“卡脖子”领域。最后, 强化市场监管, 弘扬企业家精神, 鼓励企业家诚信经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规范性引导资本的生长和流动,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14]211}, 依法打击利用垄断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四) 布局以新促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新质生产力时强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性, 并将其视为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先进驱动力。当前,中国创新指数年均增长6.5%,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快0.8个百分点^[32],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这些新兴科技领域的产业也正在推动生产工具的全方位进步,劳动者从事的简单性和重复性劳动越来越少,劳动能力迎来了新的解放,智能化、信息化的劳动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主要劳动方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是走“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20]156},而是“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13]6},通过传统产业的现代化转型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密切相连,处于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代表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立足技术基础 and 市场需求,加快布局前沿科技创新企业,推动高科技成果快速落地转化。尊重产业发展规律,给予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兴科技与传统产业高端化融合,促使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同时,科学研究从研发到应用再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由此也延伸出“技术是难点,但更难的是对市场需求的理解”^{[13]6}的难题。未来产业作为面向美好生活前景、回应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的萌芽性产业,其具体的产业形态和运作方式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预判性支持和系统性谋划,制定未来产业的中长期行动计划,并重点在生物产业、区块链产业、空天技术产业、脑科学与类脑智能产业、量子信息产业等关键性产业中培育未来产业主体。要为未来产业提供更优惠的政策补贴,提升未来产业吸引社会资本的能力,保证社会资本流入的长期性,加速未来产业的孵化进程,形成科学有效的未来产业培育生态。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3.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9.
- [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5]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3-09-09.
- [6] 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017.001>.
- [7] 周绍东,胡华杰.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012.001>.
- [8]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9] 令小雄,妥亮,金陆威.新质生产力的三重向度:时空向度、结构向度、科技向度[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0.<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101.001>.
- [10] 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31009.1552.002.html>.
- [11] 蒲清平,黄媛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11.
- [12]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是,2023(20):4-9.
- [13]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96.
- [17] 杜尚泽.“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N].人民日报,2019-03-26.
- [18] 陈曙光.“世界之问”与中国方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9.
- [1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
- [2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 [2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
- [23]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7-08.
- [24] 杜传忠.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视角下的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及其构建[J].求索,2023(2):130-136.
- [25]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2023-09-18].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9/t20230918_1942920.html.
- [26] 刘志强.去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万亿元[N].人民日报,2023-09-19.
- [2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N].人民日报,2023-02-02.
- [28] 熊钰.网络“躺平”现象与青年奋斗精神培育[J].中国青年研究,2022(2):14-21.
- [29] 陈小平,萧鸣政.青年科技人才素质模型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4):82-89.
- [30] 习近平.加强基础研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J].求是,2023(15):4-9.
- [31] 杜黎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实践根基研究[J].兰州学刊,2023(11):5-14.
- [32] 国家统计局.2022年中国创新指数比上年增长5.9%[EB/OL].[2023-10-20].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10/t20231020_1943765.html.

(责任编辑:杜磊)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Emergence Context,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Advancing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ZENG Li, XIE Pengjun

(Institute for Defense Technology and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73)
(College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Basic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73)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innovatively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demonst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Speeding up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the only road to achieve the leaping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oductiv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derived from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and has a unique emergence context,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advancing path. The need to break through the technological hegemony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hanges in relative advantages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of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productivity, and the demand for updating production modes constitute the emergenc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med under these conditions has a distinct goal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That is, it aims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boost the upgrading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realize the leap of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this end, a new national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key technologies. A high-level training system of innovative talents should be built.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efficient markets and competent governments on the emerg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to roll out a large number of emerging industries that promote new quality, thereb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ith these measures, the innovation and qualitative changes embedded i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be highlighted in the magnifi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Chang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